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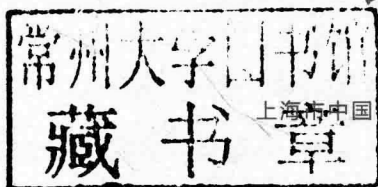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理论与实践

QUANMIAN JIANCHENG XIAOKANG SHEHUI
LILUN YU SHIJIAN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理论与实践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030-2

I. ①全… II. ①上… III. ①小康建设-中国-文集
IV. ①F1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5625 号

责任编辑 鲍 静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030-2/D·2694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中国道路:历史、现状与前瞻.....	陈春常	001
超越西方资本“增长方式”的“新常态”如何可能.....	李 振	012
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从失衡走向均衡	高 帆	028
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 静	046
外资在华环境污染与我国防范对策.....	盛 垒	063
政党、社会与中国的协商民主	高奇琦	081
传统中国地方政府运行过程中的潜规则研究		
——以明清州县政府为例.....	谷 宇	102
文化权利:发展的视角	杨龙波	118
知觉与自觉:涉老法律文化分殊	孙 颖	132
社会建设与公民美德.....	周治华	151
道德的原动力:情之所至,性情使然		
——浅谈道德情感在学校德育教学中的		
核心地位和培养方法.....	陈 果	164

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的

路径整合..... 孙 健 182

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网络公共危机的

治理思考..... 陈华栋 191

共同体方法：旧模式在欧盟新治理中的

转化、延续与回归 沈洪波 204

后记..... 222

中国道路：历史、现状与前瞻

陈春常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①中国道路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魂牵梦绕的伟大梦想，又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党和人民 90 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实践成果。中国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抓住了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契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中国道路在探索中发展日趋完善，生命力越来越强，其优越性不断发挥出来，其丰富性、独创性及世界意义正日益凸显。

一、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

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过漫长艰辛探索而取得的历史成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船坚炮利之下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动地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与此同时，中国该走何种道路、该往何处去的论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如何再造中华民族辉煌，成为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 页。

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无论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辛亥革命,各种思想争鸣碰撞,各种势力交错斗争,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华民族既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没有实现国家现代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大众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其重点在于探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基于一直照搬和借鉴的苏联体制弊端已严重暴露,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等问题,果断提出“走自己的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生产力水平以及主观因素局限性的影响,始终没有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进入以经济发展和效率优先为首要目标的重大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激活了国家内部微观主体的竞争活力,市场从边缘包围并蚕食经济中的“计划”和“公有”部分,最后跨越了经济疆界,蔓延至整个社会的机体。在社会转型中,每一地区、企业、家庭甚至个人都被深深卷入市场浪潮,在短短30年使中国快速进入相对过剩时代,为国家治理奠定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同时,当代中国利用强大的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来维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稳定,并顺利实现了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然而,在创造世界经济史奇迹和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的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② 同上书,第1471页。

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快速增加,片面强调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恶果逐渐浮现,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由平均主义、普遍贫穷让位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要求日益凸显。

进入新世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命题的提出,“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目标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举措,充分体现了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①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一头连接着国情,一头连接着理想,它承载着过去,也标示着未来。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

有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对中国转型的判断是最为复杂的,并把中国转型研究列为“制度范式”研究的四大难题之一。实际上,中国对转型探索已上升为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相当灵活的策略,即从外围建立起市场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框架与制度创新,使得人们逐渐改变一系列观念,同时利用强有力的组织资源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综观来看,中国道路是在反复吸取和总结自身与世界其他国家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中国道路是一种寻求以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
会发展模式。

首先,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欧盟模式”、“拉美模式”、“俄罗斯模式”和“印度模式”,而是一种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既坚持面向市场导向的全面改革,也注重国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并试图在两者互动中寻找平衡点。它坚持从理想、浪漫的社会主义转变为理性、现实的社会主义,从全能、革命的国家转型为有限的、以人为本的国家,从抽象的人民、阶级和国家转型为具体、鲜活的社会和个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和回归。

其次,把制度创新当作国家治理的主要动力。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开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同时发挥出来。如此,一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整体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二能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化领域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继续推行文化自觉与文化创造,推动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组织。

再次,准确找准国家定位,避免缺位、越位与错位。国家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重要对象。国家不是超脱于改革之外的角色,而是重要的当事人。国家始终没有对市场的运行放任自流,始终保证界定和执行产权的角色和责任,避免了旧体制被打破、新机制又不能承担协调任务的制度荒原、制度混乱(institutional no-man's land and disruption)。^①同时,对国家制度能力进行有效约束,拒绝国家

① 雅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掠夺之手”强力介入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坚决防止由于畸形制度结构使市场制度蜕变为“坏的市场经济”。总之，国家在维系旧制度的过程中清算旧制度，在改革新制度的过程中完善新制度。

第二，中国道路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时序和内在逻辑。

首先，作为一种后发现代化模式，政治领导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崛起的重要政治前提。它开启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新步伐，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相应变革和转型，各种综合因素最终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在执政精英倡导和推动下进行的，是国家有意识让市场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的同时，日益完善宏观调控，坚决避免纯粹的私有化，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走上一条渐进之路，逐渐形成相对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的市场力量。再次，经济转型和市场力量积极推动政治制度化和社会多元化，社会变革和发育就是在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双重动力下展开的，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走向。最后，不断坚持与强调思想解放，文化始终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中起到引领作用。

第三，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道路是一种后发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模式。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当务之急。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历史经验和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国家治理走出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坚持与实践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的协调性。在突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充分重视改革的约束条件，考虑它们特定情境与特定的脉络，注重中国现行体制转型的历史连续性以及民族特点，而不是和历史上形成的既有秩序断裂。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对发展模式的理性定位。其次，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历史选择,当代中国在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上鲜明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具体制度的改革,坚持由易到难、次第展开以及遵循“最小打乱原则”。再次,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化,转型中国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世界的胸怀,充分利用、吸收与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以建设性的态度和最大诚意对待和参与国际机制,最大限度地为自身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和谐环境。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表现出强劲的可成长性,日益显示出其蓬勃的生命力,彰显着当代中国的繁荣昌盛。

三、中国道路的内涵及挑战

中国道路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独立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并且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力和重塑力与日俱增。从道路的选择到道路的探索,再到道路的开辟和发展,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实践更加自觉。

第一,中国道路的内涵愈加清晰丰富,限定与边界愈来愈明确。

就理论内涵来看,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全新的含有基本路线、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拥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习惯性思维与做法,否则对它的把握和理解只能是片面甚至曲解的。

就时间界限来看,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经验;二是泛指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研究,他们把范畴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现在 60 多年,甚至将其推演到近代中国。本文的时间界限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惟有划清这一边界,才能凸显时代意义与彰显中国特色,把第二种观点当作历史背景来把握。

就范围向度来看,它自始就具有国内改革和国际开放两个维度,它既是中国实践经验与反思教训的结果,又具有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的内容比较,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说”的国际关注。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既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又具有国际眼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因此,我们有责任打破国内与国际的界限,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审视中国模式与人类文明的互动交融沟通,不能曲解弱化“中国模式”的全球影响。

就成熟程度而言,一是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之中,是一个正在生成、正在被构建及远未成型的模式,尚未得到世界公认;二是对中国模式认识还不深入,要真正弄清其本来面貌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它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并值得大家关注的课题。

第二,中国道路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毋庸置疑的,然而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是并存的,它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的各种复杂问题。

经济领域,“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和长期繁荣,另一方面,经济能否与社会、政治与自然协调持续科学发展。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可持续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局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比如“三高”(高投资、高消耗与高污染)“两低”(低质量和低效益)“一依赖”(能源与矿产资源依赖国外)。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虽然有些淡化,但一直没有消失且延续到现在,“政绩工程”造成低效与无效投资,“父爱主义”的残余继续使部分国企无效产出。总之,如何消除经济健康发展中的不可持续因素事关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

政治领域,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强化。未来中国必须强化在现有国家制度基础上不断完善或开发新的国家制度,面临转型的大变局,国家需要确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应对思路,唯有通过对国家基本制度的积极建设,才能为持续、稳定和协调地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国家要提高治理能力,提高领导工作的艺术性,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文化领域,文化现代化是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文化创新与文化自觉是文化繁荣的根本动力,但在文化多变性、独立性和复杂性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国家认同与思想解放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环节。

社会领域,当代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同时并存。在经济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东西部差距凸显,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多,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又面临时空压缩的巨大挑战和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等客观现实。因此,如何培育社会组织,构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打造一个对基层贫困和弱势群体关注的社会安全网,积极积累社会资本增加社会信用,这些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严峻挑战。

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绩,深入总结和探究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看到巨大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的同时,更要对这条道路所面临的复杂困难和挑战压力有着清晰的认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目前仍然面临许多需要攻克的难题和更加漫长崎岖的征途,但其治理模式可为当下与未来中国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也为现代化道路的后发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可资借鉴的国家治理范式。

首先,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我启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不容忽视。目前,改革开放已有 30 多年。客观地讲,这 30 多年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算不上什么,但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中间做权衡,我们就会感觉到这 30 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因为这 30 年为中国历史长河注入了前所未有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 30 年共和国的主要特点,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而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也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而代价又高的探索经验和教训。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在总结国际上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以及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提出的,一是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同时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探索;二是既要肯定已有成就,又要正视存在的问题,积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越走越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经验借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无论如何定位自己或者西方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个客观事实。同时,由于中国和其他后发展中国家都曾有过被压迫、被侵略的历史,经济和文化都相对比较落后,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面临着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可行性的发展路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模范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道路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发展方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苏

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基本上采用苏联模式。然而,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抛弃苏联模式,主动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结果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尽管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赢得西方赞美,但无论西方式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于是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于是,西方对俄罗斯一片责难。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①对于中国选择发展道路而言,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苏联模式之后,就去主动选择西方模式,而是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道路,这一点中国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因此,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时空区域、内部条件、外部环境以及动力机制等方面的不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道路必然是多模式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自己国情,通过不断创新和实践探索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治理道路,而不是盲从西方模式。

最后,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示范影响。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把改革开放置于国内改革和国际开放的两个维度中来探讨,开放则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100多年来,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既有高奏凯歌之时,又有陷入低谷之难。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成功,一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表明“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关键是把科学社会

^①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主义理论与国家治理现实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不断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成果,是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

对西方国家而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西方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西方社会一片欢迎喝彩,他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很快会使中国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但当他们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他们”的时候,“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责任说”等从未间断。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对他们来说,中国道路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担忧的不仅仅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发展道路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道路。

总之,只有通过历史和比较的两个角度来考察,只有通过国内和国际的两种视域来感悟,认真关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应当怎么样”和“怎么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也才能真正理解这个道路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伟大命题。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着力民生,应该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着力点。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助理研究员)

超越西方资本“增长方式”的“新常态” 如何可能^{*}

李 振

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探究个人财富如何增长,解释国家财富增长的秘密。就研究领域而言,致力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而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则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其中致力于劳动生产率、组织效率的分析又成为产业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不仅中国,而且整个世界皆面临着越来越紧迫的资源、能源、环境和文化问题,这决定了转变单纯依赖物质要素的增长方式,扩大环境成本、气候成本、未来成本的考量力度,成为新增长方式的一个事实和逻辑的出发点。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许多有关新增长方式、新发展方式、新社会文明之类的名词的空泛性和虚假性,其背后依然遵循着现代性的“共同逻辑”,其主流逻辑指向并没有改变,最多只是略微修正或改变形式和范围而已。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只要从西方走来,并带来巨大文明效应的“主流发展模式”的核心逻辑没有得到彻底的反省、批判和解构,那么,所谓“新增长方式”——一种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意义上的、经济上可行、制度上切实、道德上令人想往的新形式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十分脆弱。显然,我们所主张的“新常态的增长”必须超越这种模式,

^{*}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从金融危机看资本主义文明的意义及其限度”(09CZX006)。